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期
2015年4月，頁131-157
國立台灣文學館

明治「敗者」史觀與殖民地台灣
——以北白川宮征台論述為中心*

吳佩珍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至目前為止，台灣文學研究對日本領台五十年間的日本領台史觀可說是沿用明治維新之後薩長兩藩所主導的「勝者」史觀，也因為如此，面對當時統治者「日本」的認識不僅平板同時一元化，也因此在後殖民研究論述上過度單純化日本近代的「國族主義」。本文將由「敗者」史觀重新探討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在明治維新史的定位，對照日本的台灣殖民事始—即病歿於台灣征途當中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其在台生成的傳說與形象。除了從1895年隨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征討台灣的森鷗外其所撰寫的傳記《能久親王事蹟》探討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形象的生成與史觀差異二者之間的關係外，也將從《臺灣日日新報》連載的講談〈北白河宮殿下〉（1911.04.03-1911.12.30）探討殖民地台灣如何從「敗者史觀」建構北白川宮形象。

關鍵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臺灣日日新報》、森鷗外、大逆事件

＊ 在此謹向二位提供寶貴意見的匿名審查人致上謝忱。本稿未盡之課題，將留待後續發展。另，本文乃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日本的台灣殖民事始與「國民文學」書寫——以日據時期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形象建構與明治維新「敗者」史觀為中心」(101-2410-H-004-147-MY2)之部分研究成果。

The Prince Kitashirakawa and Colonial Taiwan:

From the Historical Views of Defeated Figures in the Meiji Period

Wu Pei-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The Prince Kitashirakawa, uncle of the Meiji Emperor, died during the pacification of Taiwan in 1895 when Taiwan became the first colony of Japan. Afterward, he became a spiritual icon for Japanese colonial rulers in Taiwan. At first glance, it is not suspicious that the Prince's sacrifice for Japan's new colony earned him recognition as a national hero. However, biographies and related materials about the Prince Kitashirakawa, both in modern and colonial Taiwan, indicate that he had been involved in political struggles between the Satsuma and Choushu regimes and the late Tokugawa regime's imperial court, and had been supported by feudal domains in the northeast during the War of Boshin.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discourse on the Prince Kitashirakawa in colonial Taiwan to expose how colonial Taiwan, as the periphery of the Japanese empire, challenged the core of Japan through questioning the legitimacy of Japan's emperor.

Keywords: The Prince Kitashirakawa, Taiwan Daily News, Mori Ogai, The High Treason Incident.

明治「敗者」史觀與殖民地台灣
——以北白川宮征台論述為中心

一、前言

日本與台灣近代關係始自1874年的台灣出兵，史上又稱「牡丹社事件」。日本自1868年明治維新之後，便開始近代國民國家發展的進程，國家在擴張的同時，也進行內外的收編。除了企圖迎頭趕上世界帝國列強，並積極加入帝國主義競逐遊戲。「牡丹社事件」正可說是其加入列強競逐的試金石。

「牡丹社事件」事發原因起自琉球漁民遭遇船難漂流至台灣恆春半島，其中五十四名遭牡丹社以及高士佛社原住民殺害。「牡丹社事件」發生後，日本開始積極主張其對琉球主權的正當性，讓前近代以來一直處於中國以及日本兩大國夾縫之中的琉球王國，其主權岌岌可危。日本以台灣原住民殺害琉球漁民為由，對清廷提出抗議。然而清廷將台灣定位為「化外之地」，讓日本根據近代列強競逐遊戲的基本規則：「萬國公法」，於1874年由西鄉從道率軍對台灣出兵，此乃官方近代史上台日的首次接觸。[1] 事實上「台灣出兵」的目的，乃企圖消解日本維新後因「廢藩制縣」而大量失業的武士階級的不滿情緒。「台灣出兵」之前，已有所謂的「征韓論」主張。在「征韓論」政爭失勢的西鄉隆盛掛冠求去，隱遁鹿兒島。「台灣出兵」決議雖有種種緣由，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可說是當時明治政府企圖對心生不滿的西鄉隆盛懷柔。「台灣出兵」的統帥雖是其弟西鄉從道，也因此西鄉隆盛表面上看來似乎並未主導征台戰役，但實質上所有軍隊調度多出自西鄉隆盛之手。[2] 1874年台灣出兵之後，士族的不滿不僅未消解，加上當時明治政府未徹底落實近代國家議會體制，自由

1 小森陽一，《ポストコロニアル》（日本東京：岩波書店，2001.04），頁23-25。原文日文，由筆者自譯，以下出自日本原文書之引文者，皆如此。

2 吳佩珍，〈日本自由民權運動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蔣渭水〈入獄日記〉中《西鄉南洲傳》為中心〉，《台灣文學學報》12期（2007.12），頁109-132。

民權運動越演越烈，在「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情勢下，西鄉隆盛率領不滿士族在九州蜂起，於1877年爆發明治維新之後最後的國家內戰「西南戰爭」。[3]至此，明治維新後，日本動盪不安的內政情勢告一段落。隨著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以及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分別打敗中國以及俄國，同時依馬關條約，由清廷割讓台灣，得到第一個殖民地。

如果依照「通史」觀點看來，以上所敘述者可視為近代日本流通的主流史觀，即明治維新之後薩摩、長州二藩所主導的歷史觀點。而台日近代關係史基本上由上述史觀來呈現，也因此，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的歷史脈絡，基本上也由上述史觀認定，成為一般流通的論述。

對日本的近代史觀而言，歷史學家成田龍一曾經指出，所謂的歷史對於創造、支撐國民國家是非常重要的裝置。也正因為如此，歷史學也常常難以介入對國民國家的批判。然而，自冷戰體制崩壞，來自「前」日本帝國殖民地對戰前戰爭責任的釐清與挑戰，也正是對支撐歷史框架的近代國民國家，以及以國民國家為理念的戰後的詰問。這些現象挑戰了敘述「歷史」的立場，讓至今為止擁有特權的歷史學地位岌岌可危。因此所謂「歷史」也是一種敘事的觀點被導入，與其緊鄰領域—文學的關連性，開始被重視。也就是說，歷史學之外的學問領域開始對「歷史」關切，而漸漸動搖了「學門」（discipline）的界線，也重新定義了「歷史」的概念。[4]

省思以上日本近期的史觀變化，再對照至今為止的台灣文學研究，可看出日本領台五十年間的研究史觀，無異是沿用明治維新後，薩長二藩所主導的「勝者」史觀。正因為如此，對當時統治者「日本」的認識不僅平板同時一元化，在後殖民研究論述上過度單純化日本近代的「國族主義」，對日本領台五十年間在台日人的文學框架建構，基本上均視為以日本宗主國為主體的「勝者」史觀「國民文學」。然而，重新省視日本統治期的在台日人文學主導者，便會發現多為東北「敗者」集團出身者，或者多與東北地域有極深淵

3 同註2。
4 成田龍一，《〈歷史〉はいかに語られるか》（日本東京：ちくま学芸文庫，2010.03），頁13-14。

源者的歷史事實。西川滿、島田謹二[5]、濱田隼雄[6]等都在此行列。不僅如此，如果從「敗者」的東北史觀出發，觀察當時在台日人的文學創作以及「國民文學」框架建構的構想與意圖，便能看出有著更複雜的重層以及無法還原於「單一」的日本「國族主義」的結構，而這與日本領台的時間點——1895年前後不無關係。此時，日本的近代國家基礎尚未底定，同時所謂「日本」的國族認同也未臻至成熟。[7]而當時在台日人的國族認同，並無法如此單純地還原還未具體成形及充滿曖昧矛盾的「日本」，而從在台日人的「敗者集團」，也可看出其「國族主義」認同中，衝突與矛盾的複雜性格。[8]其中關鍵，與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以下為北白川宮）——即幕末時被東北奧羽列藩擁立為東武天皇的「輪王寺宮」，在1895年死於台灣征戰途中後，其在台灣的神格化以及形象的建構、複製與傳播有極為密切的關係。[9]由北白川宮傳說以及當時以東北「敗者」集團在台日人作家所企圖建構的「國民文學」，都可看出其對於台灣的定義，與明治維新之後「勝者」集團的主流統治視點有差異之處。

本文將由「敗者」史觀重新探討北白川宮在明治維新史的定位，對照日本的台灣殖民事始——即病歿於台灣征途中的北白川宮其在台生成的傳說

5 島田謹二畢業自東北帝國大學英文系。

6 濱田隼雄畢業自東北帝國大學國文系，因轉向問題，之後赴台灣成為女校教師。在東北帝國大學就學期間，曾受教於也赴台任教的島田謹二。日本敗戰，返回東北之後，其作品散見於地方報紙雜誌如《河北新報》、《東北文學》，可知濱田戰後返回日本之後，仍活躍於日本東北地方文壇。

7 關於日本明治維新前後的國家體制乃至國族認同問題，吳叡人以「敗者」集團的會津藩出身的東海散士柴四朗在明治12年（1879）開始撰寫，耗時十年完成的《佳人之奇遇》為例，指出明治初期近代日本國族認同仍呈現渾沌以及曖昧不明狀態。參照吳叡人，〈「日本」とは何か：試論《佳人之奇遇》中重層的國／族想像〉，黃自進編，《近現代日本社會的蛻變》（台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6.12），頁638-669。慶應4年（1868）戊辰戰役，會津藩被迫陷入對抗薩長軍的危急狀況，家臣男子依年齡組成親衛隊。其中十六、七歲男子所組成的「白虎隊」因目擊城下陷入火海，誤以為藩城鶴之城被攻陷，二十人決心殉主，在飯盛山集體切腹自殺。其中飯沼貞吉獲救，「白虎隊」當時狀況，大部分根據其證言，流傳後世。另，會津藩遭政府軍攻擊陷入籠城當時，政治小說《佳人之奇遇》作者、柴四朗被編入護衛會津藩藩主松平容保的護衛隊「白虎隊」，但在出征時因發高燒，並未實際參與戰鬥。參照松本健一，〈白虎隊士の精神〉，歷史讀本編輯部編，《カメラが撮られた会津戊辰戦争》（日本東京： 新人物往来社，2012.08），頁44-59。

8 以西川滿為例，其自傳對於自己家族來台以及因日本戰敗被迫離台都以明治維新「敗者」史觀來書寫，對於建構近代「日本」觀點也與當時日本內地的主流意識迴異即為一例。參照西川滿，《自傳》（日本東京：人間の星社，1986），頁2、70。同時參照吳佩珍，〈日人作家的「文學史觀」疑義〉，《聯合文學》328期（2012.02），頁48-51。

9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為明治維新之後的稱謂，幕末時期其身分為上野東叡山寬永寺「輪王寺宮」公現法親王。除文本引文，本文均作北白川宮。

與形象。除了從1895年隨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征討台灣的森鷗外其所撰寫的傳記《能久親王事蹟》，探討北白川宮形象的生成與史觀差異二者之間的關係外，也將從《臺灣日日新報》連載的講談〈北白河宮殿下〉（1911.04.03-1911.12.30），探討殖民地台灣如何從「敗者史觀」建構北白川宮形象。

二、佐幕敗者到鎮台神祇——北白川宮形象的更迭

回溯日本的台灣殖民事始紀錄，基本上均由當時身任近衛師團團長北白川宮的基隆澳底登陸開始。依日本的台灣殖民事始解讀，北白川宮於1895年5月30日登陸基隆，「於嘉義南進途上罹患風土病」，「二十二日入台南城，至二十八日病勢加劇」，[10] 同年10月28日於台南駐在所死去。爾後台灣情勢底定，建造台灣神社奉祀北白川宮，成為日本南方鎮守大社。身為明治天皇的皇叔，死於台灣的北白川宮成為日本統治台灣的精神象徵——台灣神社的鎮守神祇，表面上看來似乎並無特別的疑點，但這卻是台灣的殖民史對於日本治台的史觀沿用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主流史觀檢視之故。如果由東北史觀重新省視明治維新歷史，其史觀便完全迥異於至今為止由薩摩、長州於明治維新奪權成功之後所建立的日本近代史觀。隨著日本的近代史，特別是對明治維新史觀近年的重新評價，北白川宮在明治維新時捲入幕府與朝廷之間的政爭，一時之間成為東北朝廷擁立的新帝，在明治維新史上被視為叛國謀反的歷史，便再度浮上檯面。

幕末到明治維新這段歷史，由東北敗者史觀重新回顧明治維新前後由薩摩、長州的西軍集團[11] 以及以仙台、會津藩為首的奧羽越列藩的東軍所展開的天皇正祚爭奪權的過程，乃始於戰後。[12] 前行研究中，藤井德行指出，戰前使用大量的史料，以不偏袒佐幕派或者是倒幕派的公正立場收集、編述幕末維新

10 台灣教育會編，《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事蹟》（台北：台灣教育會，1937.05）。本文引自收錄於《皇族軍人傳記集成　第3卷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日本東京：ゆまに書房，2010.12），頁140-155。

11 幕府末期，由薩摩藩與長州藩主導之軍力，由至今為止的主流明治史觀來看，多稱為「官軍」。本文由重新省視此一史觀的立場出發，於本文以「西軍」或「新政府軍」稱之。

12 長久以來被視為禁忌的東北朝廷立帝說，直到戰後才逐漸解禁。提出東北朝廷立帝說者有以下論文。如瀧川政次郎，〈知られざる天皇〉，《新潮》47卷10号（1950.10），後收入《日本歷史解禁》（日本東京：創元社，1950.12）以及武者小路穣，〈戊辰役の一資料〉，《史学雑誌》61編8号（1953.08）、鎌田永吉，〈いわゆる大政改元をめぐって〉，

史者，首推藤原相之助的《仙台戊辰史》。[13] 戰前對於北白川宮被推為天皇，乃至東北朝廷成立的構想幾乎無人提及，這樣的現象起因自日本戰前的尊皇主義，以及天皇的神格化、皇國史觀等思想壟斷歷史詮釋權。日本戰敗後，日本由美軍接管，成為實質的殖民地之後，天皇「神格化」神話崩壞，其威權受到挑戰。一直以來被視為禁忌的這段幕末政爭的明治維新史，在戰後逐漸解禁。[14] 其中藤井德行的〈明治元年　所謂「東北朝廷」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將戰後以來的東北朝廷立帝說，做了清楚的整理與解析。

幕末時，奉幕府之命鎮守京都維持治安的會津藩與薩摩、長州藩於慶應4年（1868）在京都發生武力衝突，因而引發鳥羽伏見戰爭。幕府軍敗戰，以薩摩、長州藩為首的新政府軍在戰爭結束七日之後，對仙台藩下令討伐會津藩主松平容保。東北諸藩對於新政府軍強烈的不信任感，以及對於其政權正當性依舊存疑，同時對於新政府軍要求對會津藩藩主松平容保處以死罪，抱持強烈的不滿，認為薩摩、長州有公報私仇的嫌疑。於是同年5月3日以仙台藩為盟主的奧羽越列藩正式成立，對此，薩摩、長州為首的西軍發兵征討東北，是為戊辰戰役。當薩長新政府軍攻打江戶上野寬永寺時，北白川宮被擁幕軍彰義隊擁立。之後在薩長聯軍攻入江戶之後，於關東各地逃亡藏匿，最後逃至東北，在平潟登陸，抵達仙台。之後東北諸藩成立的東北朝廷，擁立北白川宮為帝。[15]

明治天皇的父親孝明天皇是強硬的攘夷論主張者，對自幕末以來擔任京都守護職的會津藩極為信賴，一直到慶應2年（1866）因水痘急逝為止。[16] 北

《秋大史学》14号（1967）、藤井徳行，〈明治元年　所謂「東北朝廷」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手塚豐編，《近代日本史の新研究1》（日本東京：北樹出版，1981）對此東北朝廷擁立新帝論述都有其主張。相對於薩摩、長州藩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勝者」史觀成為日本近代乃至日本帝國史觀主流者，近來「敗者」東北的明治維新史觀也漸漸流通，例如2004年由專門出版東北相關史料的歷史春秋社所創刊的《會津人雜誌》季刊除了介紹日本東北地域的風土人情，同時也企圖對明治維新史重新進行東北視點的解讀與詮釋即是其中一例。

13 藤井徳行，〈明治元年　所謂「東北朝廷」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手塚豐編，《近代日本史の新研究1》，頁222。

14 參照John W. Dower “Imperial Democracy: Evading Responsibility,” in *Embracing Defeat*（New York: W.W. Norton & Co. ,2000）, pp.319-345.

15 百瀨明治，〈奥羽越列藩同盟——その成立から解体まで〉，歷史讀本編輯部編，《カメラが撮られた会津戊辰戦争》，頁6-27。

16 關於孝明天皇的死因眾說紛紜，一直以來其遭毒殺的傳說甚囂塵上。而這樣的傳聞直至日本戰後，病死論述以及毒殺論述兩派，仍爭論不休。毒殺說認為，因孝明天皇主張公武合體，對於尊王攘夷激進

白川宮為孝明天皇義弟，[17] 也因此對於對意圖在東北樹立新朝廷政權的奧羽越列藩而言，其血統之純正乃不二人選。[18] 對會津藩深表同情，因而結盟的奧羽越列藩擁立北白川宮為東武天皇，企圖藉此大義名分，對抗薩長主導的新政府軍。[19]

另，關於「輪王寺宮」（即北白川宮）[20] 在東北被擁立為帝的主張與幕府長久以來的傳說也有密切關係。北白川宮於幕末時承襲「輪王寺宮」，名為公現法親王。「輪王寺宮」是上野寬永寺代代傳承的住持名號，也是幕府菩提寺日光東照宮的司職者。天台宗的天海大僧正獲得三代將軍家光的支持，得以開山寬永寺。開山之後不久，均由京都迎來皇族出任歷代的「輪王寺宮」。據傳，天海獻策德川幕府，當「西邊諸國發生叛亂企圖夾持天皇時，當奉本東叡山皇族後裔為今上，進行平定」。[21] 這被稱為「天海密策」——即幕府對朝廷以及西邊諸侯大名所採取的預防謀反的對策，在幕府內部以及箱根以東的諸藩當中暗暗流傳。[22] 瀧川政次郎甚至指出，德川將軍對「輪王寺宮」尊崇與順從的態度，甚至高過京都的朝廷，日光東照宮的皇子（宮樣）即東邊（あづま）的天子，這與日光東照宮即東邊的伊勢神宮，東照神君即天照神君是相同的道

派的態度嚴酷，因而被當時傾向倒幕派的公卿岩倉具視等視作絆腳石，遭到毒殺。例如韓國遭日本併吞前夕的1909年，安重根暗殺當時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其中所列舉的伊藤的罪狀之一便是：「毒殺孝明天皇」。參照伊良子光孝，〈天脈拝診——孝明天皇拝診日記——〉（1）（2），《医譚》復刊47、48号。轉引自藤井徳行，〈明治元年　所謂「東北朝廷」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手塚豊編，《近代日本史の新研究1》，頁236。

17 北白川宮為孝明天皇父親仁孝天皇的養子，也是明治天皇的叔父。

18 星亮一，《奥羽越列藩同盟——東日本政府樹立の夢》（日本東京：中央公論社，1995.03），頁70-71。另，首先提出東北朝廷存在與否論述者，為日本法治史研究者瀧川政次郎在1950年於《新潮》（47卷10号）所發表的〈知られざる天皇〉。參照藤井徳行，〈明治元年　所謂「東北朝廷」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手塚豊編，《近代日本史の新研究1》，頁219-226。

19 同註18。

20 輪王寺原是德川三代將軍家光時代在日光山所建，由當時的天海大僧正（1563?-1643）開始經營，可說是德川幕府的菩提寺。天海大僧正之後的公海，迎接後水尾天皇皇子尊敬親王為日光門主，第一代輪王寺宮為守澄法親王。之後直到明治維新為止，共計13代12人法親王成為日光門主 。「輪王寺宮」歷代均由幕府指派，皇族出任。「輪王寺宮」是為日光宮門主，常駐江戶東叡山輪王寺，即上野寬永寺。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在還俗前，是最後一任的輪王寺宮。參照菅原信海，《日本仏教と神祇信仰》（日本東京：春秋社，2007.10），頁165-191。

21 參照藤井徳行，〈明治元年　所謂「東北朝廷」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手塚豊編，《近代日本史の新研究1》，第二節「輪王寺宮の制度的意義」，頁217-231。以及長尾宇迦，〈「東武皇帝」即位事件——最幕末に存在した、歴史に埋もれたもう一人の天皇〉，《歴史読本》55卷8号（2010.08），頁126。

22 長尾宇迦，〈「東武皇帝」即位事件——最幕末に存在した、歴史に埋もれたもう一人の天皇〉，《歴史読本》55卷8号（2010.08），頁126。

理。[23] 也因此，「輪王寺宮」被奧羽越列藩擁為新帝，並非是歷史的偶然，乃其來有自。

新政府軍底定東北諸藩後，「輪王寺宮」投降謝罪，被下令在京都閉門自省，赦免後復籍伏見宮家，襲名北白川宮。[24] 禁閉解除後，北白川宮懇求明治天皇，允許其負笈德國留學。然而留學期間與德國女性貴族訂下婚約，明治天皇因而震怒，在婚約消息見報後，被迫中斷留學返國。[25] 之後再度被命令謫居京都，閉門思過。後來進入近衛局，中日甲午戰爭之際，於1895年晉升近衛師團長。同年5月30日以守備軍力帶領半個師團兵力登陸台灣，隨即開始台灣征戰。當時近衛師團被派遣至遼東半島待命，是為了萬一與清廷戰事擴大，以便進入北京進行守備。然而與中國戰況並未如預期擴大，在清廷的媾和提議，隨即於1895年5月8日馬關條約訂定之後，同時在三國干涉還遼之下，急遽被命令前往台灣進行守備。明治政府隨即於5月10日任命樺山資紀為台灣總督，緊接著當時的征清大總督小松宮彰嘉親王決定派遣北白川宮率領的近衛師團充當台灣駐屯軍，5月16日征清總督命令近衛師團等待台灣總督命令，隸屬台灣總督指揮下，候命派遣至台灣。

日本皇族自明治近代以來擔任軍職已成沿革，但一般將領，即使軍階高於皇族出身的軍官，也無法對其肆意指揮調度。也因此北白川宮所統率的近衛師團，原來以守備狀態駐屯遼東半島，但在台灣總督樺山資紀的命令下，突然以半個師團兵力，受命登陸台灣，進行討伐，急遽進入戰鬥狀態。當時隨行的軍官西川虎次郎於其回憶錄中如此回顧：「甲午戰爭的結果，台灣以及澎湖島歸日本所領有。當時我近衛師團在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殿下的統御下，駐屯遼東半

23 瀧川政次郎，〈知られざる天皇〉，《新潮》47卷10号，頁124。

24 奧羽越列藩同盟敗戰之後，「輪王寺宮」決定謝罪投降。另，將兩位執事僧義觀與堯忍免職。之後義觀被送往東京糺問司接受訊問調查，義觀擔起全部責任，供稱：「今春以來一事〔按：指北白川宮由彰義隊擁立，決定佐幕除薩路線〕，非出自親王本意，皆野衲一人計謀」，之後死於獄中。後世皆以義觀（覺王院）此番供詞，認定北白川宮出任奧羽越列藩同盟盟主並成為「東武皇帝」，都出自義觀教唆，而非北白川宮本意。參照藤井德行，〈明治元年　所謂「東北朝廷」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手塚豐編，《近代日本史の新研究1》，頁306-308。

25 近期關於北白川宮留德期間與德國貴族的婚約問題，見浅見雅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明治帝を激怒させたドイツ貴族との婚約〉，《文藝春秋》（2011.03），頁330-332。而明治天皇傳記《明治天皇紀》中也言及此事。

島。說是師團，但只有半師團兵力，充當遼東半島之守備。然而突然受命守備台灣，身著冬衣的情況下，緊急趕往台灣。當然我們當時對於台灣不僅一無所知，同時完全未預期會有戰爭。運送船被命令於蘇澳灘集合，之後依海軍的通報，決定了登陸地點。直到那時，才開始有著我們或許無法安全登陸也未可知的念頭」。[26] 在此段記述之後，西川回憶當時最感苦惱的，是沒有台灣地圖。由此回憶錄可知，北白川宮所引領的近衛軍團，事前並未被告知將會進入戰鬥態勢。同時也可從以上敘述得知，北白川宮的近衛軍團是在毫無作戰計畫以及台灣地理情報的狀況下，進入戰鬥狀態。以皇族之尊親身征討「蠻夷之地」台灣，原本便極不尋常，同時北白川宮駐屯遼東半島時已罹患瘧疾，[27] 也因此自基隆登陸直到在台南去世，其滯台時間僅短短數月，然而卻被神格化為當時日本治台的精神象徵台灣神社的鎮守之神。[28] 之後，北白川宮征台事蹟在日本領台五十年間，其傳記以及傳說不斷被複製、再生，於台灣流傳，成為日本統治台灣的精神象徵。

三、東北朝廷立帝說的虛與實——森鷗外《能久親王事蹟》中的北白川宮形象

北白川宮事蹟在殖民地台灣時期的流傳與複製，基本上從1910年代便由當時隨能久親王征伐台灣的近衛師團軍官以回憶錄形式撰寫而開始。之後直到1940年代戰爭時期，北白川宮神話則再次被動員。[29] 即使是以傳記形式書寫，對於征台戰役之前的歷史一概輕描淡寫，且均聚焦於其滯台期間，即1895年5月30日至同年的10月28日期間的征戰經過。[30] 日本國會圖書館現存的相關資料與北白川宮傳記對其「輪王寺宮」時代，即「明治維新」主流史觀強調的幕末

26 西川虎次郎，〈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殿下の御征戦に従ひて〉，《臺灣》7卷1號（1936.01），頁4。
27 台灣教育會編，《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事蹟》，頁20。
28 同時有史料指出北白川宮在抵達新竹時，便在牛眠山中彈身亡，日軍怕影響士氣，密不發喪。參照黃榮洛，《北白川宮は新竹で死んだ》（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86.07）。而日本乃至戰前台灣所流傳的北白川宮傳記均記載其在台南因瘧疾加劇病逝，但秘不發喪，將遺體運回東京舉行喪禮。1908年所出版的森鷗外《能久親王事蹟》對此過程有詳細描寫。
29 台灣所發行、流通的北白川宮傳記，擬預定之後撰稿再述。
30 如台灣教育會編撰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事蹟》，以及前近衛師團通譯官吉野利喜馬，《北白川宮御征臺始末》（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23）等。

能久親王隨佐幕派流亡至東北，被認定企圖謀反的歷史，其實都有一定程度的呈現。然而，檢視北白川宮的台灣征討戰役，便會發現疑點甚多，也由於北白川宮與東北諸藩敗者以及明治新政府之間錯縱複雜的關係，同時讓日本1895年征台史蒙上了陰影。例如，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登陸台灣時的部屬西川虎次郎隨北白川宮登陸台灣戰役的回顧，便能發現個中的疑點。[31]

另，華嚴宗佛學研究者龜谷天尊等所著的《北白川宮》傳記，對北白川宮如何捲入幕末政爭以及台灣征討始末，也提出了疑義。[32] 龜谷敘述幕末奧羽越列藩對於薩摩、長州二藩以新政府軍的大義名分對德川幕府以及東北諸藩進行征討乃是夾私怨報復，企圖代替幕府掌握政權，因此東北諸藩寧願戰死，也不願坐以待斃。而由江戶逃往仙台的北白川宮便被奧羽越列藩奉為盟主，得以讓東北諸藩師出有名，與薩長二藩帶領的西軍對抗。[33] 而對於之後北白川宮受命以守備軍力征討台灣一事描寫與對台灣總督府的批判，可知當時北白川宮的處境艱難。其中敘述由於近衛師團預定於北京原野交戰，並未預料到台灣島國將成為主力戰場，因此面對島國台灣的險峻山路，並未有足夠應對的運送人夫。登陸時僅攜帶三日份糧食，士兵也只帶有二百餘發子彈。此外，台灣抗日義軍抵抗激烈，台灣總督府早有耳聞，但卻處處對師團牽制，對於後路守備乃至地理位置以及敵情的掌握幾乎完全空白。[34] 當時總督府雖是行政組織，但卻具有指揮守備隊的權限。從該傳記的字裡行間可讀出，北白川宮所率領的近衛師團可說是台灣總督府的「棄子」。也暗喻幕末戊辰戰爭北白川宮為東北諸藩奉為盟主與薩長二藩對抗的恩怨，在明治維新之後由薩長掌權的情況下，北白川宮

31 參照註25。

32 龜谷天尊又名龜谷聖馨，明治至昭和期的佛教學者與教育者。生於安政3年，研究大乘佛教，特別是「華嚴」教理。曾任東京名教中學校長。著有《華厳大経の研究》、《仏陀の最高哲学とカントの哲学》等。

33 龜谷天尊、渡部星峯，《北白川宮》（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1933），頁44-46。藤井德行指出，此傳記關於北白川宮親信的執事僧侶覺王院義觀以及竹林坊曇覺的相關論述，二者時有混淆，故有與史實出入之虞。參照藤井德行，〈明治元年　所謂「東北朝廷」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手塚豊編，《近代日本史の新研究1》，頁225。由於關於北白川宮傳記內容，論及台灣出兵者，除龜谷天尊、渡部星峯的《北白川宮》與森鷗外的《能久親王事蹟》之外，目前尚未發現其他的詳細記載史料，故本文先採用此二文本以供對照。

34 龜谷天尊、渡部星峯，《北白川宮》，頁82-83。

為何以皇族之尊卻親身涉險，最後死於日本的「新領土」—台灣。

另一親王的傳記為森鷗外的《能久親王事蹟》，其影響，可從學術論文以及歷史小說書寫對於該傳記的頻繁引用窺見。同時，此傳記對於日本統治期在台日人作家以及文學主導者也影響甚鉅。[35] 而鷗外之所以成為北白川宮傳記的作者，是因為森鷗外不僅參與甲午戰爭，之後也隨近衛師團移師台灣，參與征討之役。森鷗外研究中，對於森鷗外在甲午戰爭結束，然而旋即遭到緊急異動，奉命參與台灣征討戰役也被認為是疑點重重。對照戰前島田謹二所撰寫的〈征台陣中の森鷗外〉，島田仔細爬梳鷗外參與台灣戰役的所有相關資料，如《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明治二十七八年役陣中日誌》，島田謹二推斷森鷗外滯台期間應為明治28年（1895）5月30日至9月27-28日。但他也指出，鷗外的甲午戰爭以及征台戰役的日誌《徂征日記》，幾乎未著墨台灣征戰，不過鷗外登陸台灣參加征台戰役的紀錄卻可由1908年出版的《能久親王事蹟》窺見。[36] 同時並指出，森鷗外雖然參與甲午戰爭以及1895年的登陸台灣戰役，但其作品論及台灣者，除了《徂征日記》之外，便屬北白川宮傳記《能久親王事蹟》對於台灣的著墨最多。[37]

《能久親王事蹟》的刊行，構想源自明治29年（1896）時，曾隨北白川宮率領的近衛師團登陸台灣的將校十餘名所組成的棠陰會。在棠陰會會員分工調查，進行資料整理後，囑咐台灣之役當時同屬於近衛師團的軍醫鷗外編撰，最後會同會員們校正，於明治41年（1908）出版刊行。森鷗外在《能久親王事蹟》對於幕末時期的「輪王寺宮」時代，特別是為東北諸藩擁立為新帝以及之後被命禁閉自省的描寫，幾乎都以曖昧的筆調帶過。該傳記中與之成為對照者，則是對之後北白川宮自登陸台灣，一路往南征戰過程，鉅細靡遺的描寫。

例如對於「輪王寺宮」在上野寬永寺受到薩摩二藩率領的政府軍攻擊，

35 如島田謹二以及西川滿，都對森鷗外極為推崇。而島田謹二〈征台陣中の森鴎外〉、藤井德行〈明治元年所謂「東北朝廷」成立に関する一考察〉，以及吉村昭的歷史小說《彰義隊》（日本東京： 新潮社，2010.01）都引用了《能久親王事蹟》，同時論及此傳記的影響。

36 島田謹二，〈征台陣中の森鴎外〉，《華麗島文学志——日本詩人の台湾体験》（日本東京：明治書院，1995.06），頁65-67。

37 同註36，頁94。

進駐上野寬永寺護衛「輪王寺宮」的「彰義隊」被擊潰時，榎本武揚以軍艦長鯨丸至羽田灣迎接「輪王寺宮」的描寫。森鷗外對「輪王寺宮」當時對前往東北的決定，作了如下的敘述。「東叡山道場遭逢兵難，已失棲身之處。近日諮詢左右，皆道江戶危險，縱使倚靠大總督府，應也難期安全。因此暫時避亂奧州，待皇軍平定國內之日」。[38] 此一視點顯然企圖淡化，並強調「輪王寺宮」並無謀反意圖，同時對於新政府軍＝皇軍的正當性毫無疑慮。此外，抵達東北之後「輪王寺宮」如何在奧羽列藩簇擁下，被立為新帝的經過，卻幾乎沒有著墨。最主要透過側近的覺王院義觀的視點，推移「輪王寺宮」如何自江戶逃至東北，以及被奧羽越列藩推舉為盟主的經過。傳記中心人物的「輪王寺宮」幾乎從未在這段時空，針對當時情勢發言。由奧羽列藩所組成的公議府成立，同時在「輪王寺宮」抵達仙台時，以仙台藩為首的諸藩要員，請求親王留宿白石城經過的描寫，可見一斑。「二十三日（按：慶應四年六月），仙台的朽木五左衛門……木滑要人六人謁見殿下，請求讓殿下速赴仙台，將白石城充當旅舍。白石城為當時奧羽列藩的策源地，稱公議府。覺王院答云：『赴仙台之時日，只要列藩舉行和議請求，殿下定然遵從』。[39] 這與鳥羽・伏見戰爭爆發的慶應4年（1868）1月至松平容保等被送往東京的同年10月為止以會津藩為中心，記錄其每日動向的史料《会津藩戊辰戦争日誌》，形成強烈的對照。此史料記錄慶應4年（1868）6月16日「輪王寺宮」承諾就任奧羽越列藩同盟盟主，而在同年6月23日列藩同盟在白石城的軍議所改稱公議府，擁盟主「輪王寺宮」，仙台藩主伊達慶邦與米澤藩主上山齊憲就任總督，確認體制的同時，與新政府敵對態勢也告明朗。同時，奉「輪王寺宮」為東武皇帝，年號改元大政。[40] 對照森鷗外對「輪王寺宮」流亡東北的描寫，顯見鷗外對於此謀反歷史採取極度壓抑的筆調，特別是對照北白川宮登陸台灣之後一路征戰，直到於台南逝去為止的描寫，可顯見二者之間的反差。也可說鷗外對「輪王寺宮」這段

38 底線為作者所加。森鷗外，〈能久親王事蹟〉，《鷗外全集》第三卷（日本東京： 岩波書店，1987）。頁536。
39 同註38，頁541。
40 菊地明編，《会津藩戊辰戦争日誌》（上）（日本東京：新人物往来社，2001.09），頁330、340。

幕末謀反的歷史，採用明治維新之後的「勝者」主流史觀，將「輪王寺宮」的擁幕、與東北列藩結盟乃至被擁立為「新帝」的決策轉嫁給「輪王寺宮」親信、執事僧覺王院義觀。[41]

鷗外對於台灣征戰的具體描寫，當然與森鷗外親身經歷此戰役不無關係。不僅森鷗外隨近衛師團登陸台灣，參與台灣征討戰役，其自身也留下登陸台灣記錄的《徂征日記》。也正因為如此，當時隨北白川宮征台部屬的請求下，森鷗外花費數年撰寫親王傳記《能久親王事蹟》。然而，森鷗外在自身的《徂征日記》當中，對日軍在台的戰鬥情況幾乎沒有著墨，但卻在《能久親王事蹟》中詳述近衛師團在台的征戰經過。鷗外的北白川宮傳記描寫視點主要仍在彰顯北白川宮台灣征戰的英雄事蹟，強調其台灣征戰的功績，當然也為了強調其成為鎮台神祇的正當性，因此儘量淡化乃至試圖抹去北白川宮曾對明治天皇謀反的歷史記憶。隱晦曖昧地處理其「叛國謀反」的前半生，強調突顯其「悲劇英雄」事蹟的後半生，其實正符合明治維新以降，新政府對這段歷史的史觀立場。村上祐紀則指出，北白川宮幕末的敗者歷史正是其具向心力形象所在的原因，不僅因為北白川宮乃日本近代具皇族身分軍人的英雄，同時也是從敗者得以轉變成為英雄者。也因此，這樣的悲劇生涯具有凝聚藩閥、舊幕派二者向心力的機能。鷗外在執筆傳記時，應該有意識地投射以上觀點於北白川宮生涯的描寫。[42] 而這也能詮釋為何鷗外對於其「暗」的前半生以隱晦筆調呈現，一方面則鉅細靡遺地突顯在台灣這樣的「瘴癘之地」奮戰之後，斃命的「悲劇英雄（＝明）」的後半生。

四、台灣神社建構系譜——北白川宮與出雲系神話之開拓三神

北白川宮病逝於台灣之後，該年已經出現建設奉祀其神社的提議。然而當時的台灣總督府要遲至帝國議會兩院決議一年半之後，第三任台灣總督乃木希典於1897年9月1日於總督府內設置「故北白川殿下神殿建設調查委員」，才開

41 參照註24。
42 村上祐紀，〈「皇族」を書く——『能久親王事蹟』論〉，《鷗外研究》88號（2011.01），頁52-53。

始有具體的建設計畫。[43] 而神社的建設一直要至1900年5月28日才開始，同年9月18日內務省告示第81號，告示台灣神社的創立以及將此神社列格為官幣大社。1901年10月27日舉行鎮座式，於隔日能久親王逝世六周年，舉行第一次例行祭典。[44]

由台灣神社奉祀的神體以及與其他神社之間的關聯性來看，可看出台灣神社的鎮守意義以及台灣新領土於帝國中的定位與意義。首先台灣神社除了奉祀北白川宮之外，還與大國主神、少彥名命以及大國魂神三神並祀。菅浩二指出，當代人逝後進入官幣大社格式的神社接受奉祀並不尋常。當時內務省對於北白川宮應被奉祀於官幣大社的理由，除了強調北白川宮與日本武尊的類似性，對於官幣大社奉祀當代者，也舉出日本武尊為先例，主張北白川宮入祀官幣大社的正當性。[45] 日本武尊於《古事記》與《日本書紀》中皆有記載，為記紀傳說中的開國英雄。特別在《古事記》中，敘述其受命於父親景行天皇四處征討，在西征熊襲歸來不久後，再度被下命前往征討東方的蝦夷。受命的日本武尊於途中前往伊勢的神宮，與在此侍神的叔母倭比賣命相會。日本武尊向叔母說道：「父王是想我早死吧？為何派我前往征伐西方不服膺者，讓他們歸順後，緊接著，為何不給我軍隊，又派我到東方十二道平定不服從王威的惡人呢？想來，天皇果然還是想我早死吧。」[46] 此一節描寫「對天皇的出動命令感到憤怒，但卻無法抗命，也無法抗議，只能邁向戰場的崇高悲壯」，這與北白川宮1895年奉命征台的情境可說是重疊的。而日本內務省強調其與日本武尊之間的類似性，也可說明北白川宮於征台之役中所扮演的，正是如同「日本武尊」這樣悲劇英雄的角色。

此外，奉祀北白川宮台灣神社與日本殖民朝鮮半島之後所建構的朝鮮神宮最大的差異在於：朝鮮神宮供奉的神祇，是天照大神，也是日本天皇的皇祖神。台灣神社所供奉者的大國主神、少彥名命以及大國魂神，被譽為開拓三

43 菅浩二，《日本統治下の海外神社》（日本東京：弘文堂，2004.09），頁249。
44 同註43。
45 菅浩二，《日本統治下の海外神社》，頁250-251。
46 上田正昭，《日本武尊》（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1960.07），頁121。

神，屬於出雲系神話的神祇。這與當時北海道神社供奉的神祇相同，基本上，北海道與台灣同為帝國新領地，供奉開拓三神應符合常理，但先行研究指出，當時內務省選擇此三神與北白川宮鎮守台灣神社的理由是不明的。[47] 然而如果回歸日本記紀神話當中大和王朝的建國起源傳說，便可知大國主神將國家讓渡給大和王朝，另外在葦天原建國，便是出雲國以及出雲大社的起源。而少彥名命則是輔佐大國魂神的藥理之神，同屬於出雲系神祇。雖然大國主神因為讓國傳說而被認為乃是輔佐大和王朝建國的神祇，但據《古事記》記載，垂仁天皇的皇子本牟智和氣御成人之後因為無法開口說話，之後天皇夢見神諭，才知當時大國主神的讓國條件，是必須為大國主神建構與天皇一樣規模的宮殿，但天皇卻未履行承諾，因此大國主神才作祟皇子。直到天皇派遣皇子到訪出雲參拜，為大國主神建造宮殿，這才痊癒。也因此這神祇也被視為有反天皇的性格。[48]

台灣神社完成後，於台灣發行的北白川宮傳記如雨後春筍般，大量發行。而這與台灣官方的推波助瀾有密切的關係。1903年7月能久親王銅像建設委員兼發起人的男爵長谷川好道，發函給當時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說明從建設台灣神社的經費中撥出一部分，用於「兒童的精神教育」。以此費用便用來印刷北白川宮銅像照片以及傳記《征台略記》，希望能代為寄贈至「各師範學校以及高等小學校」。同年7月21日，總督府陸軍幕僚隨即行文民政部，指示將北白川宮銅像以及傳記分發至島內各級學校。[49] 由此可知，北白川宮的「開台英雄」形象，便是結合了教育體制與官方宣傳，逐漸於台灣滲透與流傳。

五、殖民地台灣媒體中的「北白川宮」形象——明治「敗者」史觀再現與1911年的大逆事件

北白川宮於1895年10月28日於台南逝世後，在台灣密不發喪，遺體火速

47 菅浩二，《日本統治下の海外神社》，頁251。
48 滝音能之，〈ヤマト政権にとっての「出雲神話」を読み解く〉，《歴史読本》58巻6号（2013.06），頁58-63。
49 「台灣史料稿本」C00158-C0159號公文。

運回日本後，才正式發表親王於台灣征戰途中逝去的消息。1895年11月5日於東京舉行國葬，同月6日於上野以及日光之二輪王寺舉行法會，11日葬豐島岡。[50] 喪禮記錄中最引人矚目者，乃台灣教育會所編撰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事蹟》中「葬儀彙報」的福島縣會議長致弔詞的報導。「據說福島縣會議長目黑重真據縣會決議，因能久親王薨去，九日上京，奉呈如左弔詞，同時參列昨日葬儀。」[51] 明治維新之後實行廢藩置縣，明治維新的敗者「會津藩」，改制成為福島縣。北白川宮喪禮中，日本全國唯獨福島縣派出縣代表上京弔唁，並出席喪禮。對照明治維新政爭的敗者歷史，可知幕末時期北白川宮與東北諸藩淵源。也因此福島縣縣長出席北白川宮喪禮的特殊意義，可見一般。

1895年11月西村時彥（號天囚）於日本大阪朝日新聞連載〈北白川之月影〉（1895.11.06-11.16），之後又在該報發表「於台灣奉祀親王之議」，[52] 主張在台灣建造神社，奉祀北白川宮，此篇報導亦是最早提議建設台灣神社者。隔年1896年貴族院議會便有以國費建設台灣神社建議案的提議，德川家達（即德川幕府後裔）率先表示贊同。決議過程中唯一反對者，為侯爵醍醐忠順。醍醐忠順雖未明述反對理由，但慶應4年（1868）幕末，其將嫡子忠敬送往東北任奧羽鎮撫總督府副總督，征討奧羽越列藩，也因此對於曾任敵軍盟主的北白川宮，情感上仍存有間隙。針對醍醐忠順的反對立場，子爵曾我祐準則發表贊成建議案的演說。實際上，曾我與薩長派閥對立，因而辭去軍職，對北白川宮抱有好感。[53] 由以上台灣神社建設建議案的決議始末，我們依然可窺見幕末政爭，「薩摩」與「東北」對立的心結依舊存在。而台灣神社具體建設要直到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以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任內，才算塵埃落定。日本領台初期，兵馬倥傯，還無法具體落實建設。台灣神社在被譽為殖民期台灣建

50 吉野利喜馬，《北白川宮御征臺始末》。引自《皇族軍人傳記集成　第3卷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頁94-95。

51 台灣教育會編，《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事蹟》。引自《皇族軍人傳記集成　第3卷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頁289。

52 西村天囚，〈能久親王を台湾に奉祀する議〉，《大阪朝日新聞》，1895.11.07。

53 菅浩二，〈「台湾の総鎮守」御祭神としての能久親王と開拓三神官幣大社台湾神社についての基礎的研究〉，《明治聖徳記念学会紀要》復刊36号（2002.12），頁104-106。

設推手的後藤新平任內完成雖合情合理，但此處值得關注的是：後藤新平也出自「敗者」東北諸藩之一，乃東北岩手水澤武士出身。「幼時體驗嚴酷的戊辰戰爭，一家人從威風凜然的武士階級敗落至貧苦佃農，他的青春與日本的『近代』自此開始」。[54] 對照出身東北的後藤新平在其任內完成台灣神社的建設，日本領台初期，台灣總督樺山資紀與副總督的高島等薩長勢力的主政時期，台灣神社建設案一再延宕，隱隱再現殖民地台灣中明治維新政爭的政治力學構圖。

北白川宮相關傳記在殖民地台灣時期所發行的種類，可說是凌駕內地。這不僅與北白川宮於德川幕府時期捲入佐幕的東北諸藩與倒幕的薩長勢力之間的戊辰戰爭，同時也與北白川宮在1895年攻略台灣時，於前線征戰，之後感染瘧疾，最後死於台灣的歷史背景有極密切的關係。除了透過教育體制的推波助瀾，殖民地台灣媒體中的北白川宮形象又是如何被建構呢？我們可從《臺灣日日新報》連載的講談〈北白河宮殿下〉（1911.04.03-1912.01.24）一窺究竟。

〈北白河宮殿下〉作者為講談師松林伯知（1856-1932），1911年4月2日，即在新聞連載開始的前一天，已經事先於《臺灣日日新報》預告：「松林伯知特地為本社連載與本島關係匪淺的台灣神社御神靈北白川宮殿下的一生，聊酬諸君的眷顧。殿下仍名為輪王寺宮時代當時，經歷砲火槍戟，經歷一部慘澹的幕末史。任近衛師團長，以金枝玉葉之身，置身於瘴霧仍深的本島中之蕃風蕃雨，遂成就平定全島之勳業」。[55] 松林伯知本名為柘植正一郎，為活躍於明治時期的講談師，別號貓遊軒，明治一〇年代左右曾於銀座的銀座亭開講。同時期山名克巳於銀座開設的代言社麗澤館（按：即今日的法律事務所），聘請甫自英國留學返國的法學士星亨擔任法律顧問。[56] 星亨於明治15年進入自由黨，曾為自由黨總理板垣退助的重要輔佐者，是自由民權運動中的核心分子，

54 山岡淳一郎，《後藤新平　日本の羅針盤となった男》（日本東京：草思社，2007.03），頁10。
55 松林伯知，〈新講談預告〉，《臺灣日日新報》，1911.04.02，6版。
56 篠田鉱造，《銀座百話》（日本東京：岡倉書房，1937.05），引自紀田順一郎編，《近代世相風俗誌集7》（日本東京：クレス出版，2006.01），頁48。

同時也可說是催生日本近代政黨政治成立的重要功臣。[57] 自由民權時期的自由黨擅長利用政治講談作為宣傳自由民權運動的手段，由此可知，松林伯知與星亨等自由民權派成員有密切關係。其所屬松林派擅長即席講談，或稱時事講談，擅長將時事改編為講談題材，也因此博得人氣。其代表作品眾多，但其為《臺灣日日新報》所撰的〈北白河宮殿下〉至今為止，並不為人所知，松林伯知現存流通的講談作品中，也未見此作品。根據〈新講談預告〉的內容推斷，此部講談極有可能是松林以這位死於台灣征戰的悲劇英雄為題材，特別為當時台灣代表性媒體《臺灣日日新報》所撰寫。

此講談共連載132回（1911.04.03-1912.01.24），其中描寫北白川宮出生，之後進入江戶輪王寺宮寺（按：即上野增上寺），成為輪王寺宮，經歷鳥羽伏見戰爭，之後官軍進攻上野。為保衛輪王寺宮而進駐上野輪王宮寺，被視為佐幕勢力的彰義隊敗戰後，輪王寺宮輾轉逃亡，最後逃至東北。此講談對於西軍進攻上野前夕有極長的鋪陳，對於輪王寺宮身處德川幕府以及薩長為主的西軍之間，被汙名化為賊軍，乃至明治維新之後，襲名為能久親王北白川宮的曲折經過，有鉅細靡遺的描寫。此講談連載期間，講者松林伯知曾經因病而中斷近三個月。[58] 此作品形式雖為講談，但內容即是北白川宮傳記。松林柏知的講談的特色，向來以反映當代的政治時勢著稱，此〈北白河宮殿下〉具有同樣的特色，因此也可讓我們可進一步觀察這篇在台灣流通的北白川宮傳記所反映的史觀以及時事觀點。

傳記對於北白川宮出生前的描寫，突顯其乃日本武尊的形象，正強化其被入祀台灣神社的理由。第12回（1911.04.15），描寫北白川宮生母堀口女房於懷胎時，夢中出現惡鬼，此時「遠處彼方有個披散著黑髮，姿態高貴，騎著神馬，手持寶劍者，出現在惡鬼面前」。之後北白川宮出生，堀口女房發現其與夢中人神似。之後見到日本武尊手持草薙劍對抗烈火的彩繪，認為其與夢中

57 參考「Japan Knowledge」「星亨」項目（來源：http://japanknowledge.com/lib/display/?lid=1001000212424）。

58 松林伯知於1911年5月20日第47席（回）刊載完後便因病休講，直至同年8月17日病癒之後才又復刊。

人實在神似，也因此認定北白川宮為日本武尊轉世，是為祥兆。[59] 回顧之前史實的敘述，首先主張於台灣奉祀能久親王的西村時彥在其〈於台灣奉祀能久親王之議〉[60] 中，已將北白川宮比喻為景行天皇皇子的日本武尊，主張將其列入為國犧牲的皇族行列。之後內務省對總督府台灣神社神體照會書的回覆，同樣強調北白川宮與日本武尊的類似性，以強化其入祀台灣神社的正當性。[61] 在此處，我們可發現日本武尊形象被強化的論述如何再次被複製。

此傳記另一引人注目的描寫，則是南北朝隱喻的反復呈現。四十九回（1911.08.19.）中描寫西軍即將進入江戶，而為保護輪王寺宮（按：即北白川宮）的彰義隊則陸續於上野寬永寺集結。憂慮輪王寺宮安危，前來問候的曇覺大僧正（即覺王院），見到輪王寺宮桌上的詩作，便問起原委。輪王寺宮答道：「昨夜在庭前賞月，眺望春色，返來見到床間掛軸，原來是吉野風景，突然便想起了南北朝。（中略）題芳野山圖（按：芳野日語讀音與吉野同，即指後醍醐帝所在的南朝吉野）香雲香雪壓山樓，檻外清流澹不流，欲問當年興敗事，落花枝上鳥聲愁。」。[62] 而當西軍攻破上野，輪王寺宮與執事僧竹林院一行喬裝潛逃，正派人前往與榎本武揚交涉，是否搭乘其停泊於品川的回陽艦，離開江戶。但不知結果，還不知何去何從時，隨行的執事僧竹林坊不覺流下淚來，吟出：「自出笠置之山，天下無隱身之處」。同時感嘆：「後醍醐帝其古事正在眼前」。[63] 此指日本南北朝出現二位天皇的政爭歷史。後醍醐帝（1288-1339）因企圖對抗鎌倉政府，之後舉兵失敗，遭到流放。之後在楠木正成以及足利高氏（尊氏）的協助下，完成討幕，建立建武新政。但武士對新政不滿，尊氏另外擁立光明天皇，是為北朝。之後後醍醐帝逃至吉野，建立南朝，與北朝以及尊氏對立。後逝於吉野。[64]

---

59 松林伯知，〈北白河宮殿下〉第十二回，《臺灣日日新報》，1911.04.15，6版。
60 西村（時彥）天囚，〈能久親王を台湾に奉祀する議〉，《北白川宮の月影》（日本大阪：大阪朝日新聞会社，1898）。
61 菅浩二，《日本統治下の海外神社》，頁250-251。
62 松林伯知，〈北白河宮殿下〉第十二回，《臺灣日日新報》，1911.04.15，6版。
63 松林伯知，〈北白河宮殿下〉第一百二回，《臺灣日日新報》，1911.12.18，6版。
64 參照Japan Knowledge〈後醍醐帝〉《日本人名大辭典》項目（來源：http://japanknowledge.com/lib/display/?lid=1001000091751）。

此傳記的連載始於1911年4月，直至1912年1月底為止。如果對照1911年當時的時代背景，便能理解「南北朝」記號為何在此反復出現。幸德秋水與菅野須賀子等人於1910年5月因持有爆裂彈被發覺，6月各自被逮捕，同時以企圖謀殺天皇罪名的「大逆罪」被起訴。1911年1月24名被判處死刑，於同年1月底，包括幸德秋水與菅野須賀子等10名被處以絞刑。[65] 據瀧川政次郎指出，1910年大逆事件的起因，與南北朝正閏說有密切關係，同時也引發了1911年南北朝正閏說論爭的戰火。據傳幸德秋水在審判法庭時，法官對其企圖謀殺天皇一事怒斥：「你可知道你這可是人天不容的大逆行為嗎？」，對此，幸德秋水毅然決然地放言道：「現今天皇難道不是從南朝天皇處掠取三種神器的篡奪者的子孫嗎？」。[66] 但由於大逆事件的審判為不公開，據說秋水以上發言的風聲外洩後，大阪的代議士藤澤元造在議會質詢小松原文部大臣，追究其必須為發生如此不當思想負起責任。此外，撰寫國定教科書的喜田真吉博士，因為主張南北朝均為正統天子的內容而被追究，並因此遭到罷黜。基本上在日本戰前，「南朝正統說」乃為主流，但明治天皇一支，乃北朝系統。

也因此大逆事件緣故，日本於1911年2月至7月之間掀起「南北朝正閏說」論爭，而此事件被視為「戰前具代表性的學問鎮壓事件，同時也是強制皇國史觀於國民，確立天皇制意識形態的事件」。[67] 而松林伯知〈北白河宮殿下〉中反覆地以南北朝意象來隱喻北白川宮的境遇，特別是以吉野朝廷的後醍醐帝來比喻北白川宮，可知松林伯知將明治維新的政爭，比喻為南北朝的政爭，同時借當時時事的大逆事件，暗示東北朝廷所擁護的北白川宮，才是正祚。而1911年10月28日的《臺灣日日新報》報導了一則記事：〈北白川宮仙台滯留期間事〉，正可與此時事背景相呼應。[68] 此篇文章首先點出慶應四年（1868）西軍進攻上野，擊破彰義隊之後，北白川宮便滯留仙台以及當地的仙岳院。世上風聞其乃受奧羽諸藩強行挾持而到東北，但卻是與事實大異其趣。這篇報導指出

65 清水卯之助，《菅野須賀子の生涯》（日本大阪：和泉書院，2002），頁307-308。
66 瀧川政次郎，《日本歷史解禁》，頁114-115。
67 參考「Japan Knowledge」〈南北朝正閏論〉項目（來源：http://japanknowledge.com/lib/display/?lid=1001000173344）。
68 撰者不詳，〈北白川宮仙台御滞在中の御事〉，《臺灣日日新報》，1911.10.28，3版。

「避難當時以及仙岳院的相關事蹟，透過木村匡的介紹，自仙台山本育太郎處得到更詳細的記事與仙岳院的照片，介紹如左」。此篇報導除了說明北白川宮當時仍身為日光御門主，因此「移座」至仙台東照宮的分院——仙台仙岳院，更詳述其在西軍攻破上野輪王宮寺後，自後山潛逃至三河島。之後因西軍嚴密搜索，便喬裝成醫生學徒往診時的裝扮。在仙台藩的接應下，於7月2日抵達仙台仙岳院。之後北白川宮的動向，與其之後曾為「東北朝廷」立為「新帝」的傳聞有極關鍵的關係。7月10日下達令旨予仙台藩藩主伊達慶邦父子，其部分內容如下：「日光宮御令旨嗟呼薩賊、久懷兇惡、漸恣殘暴、以至客冬、違先帝遺訓、而黜攝關幕府（中略）、速殄凶逆之魁、以上拔幼主憂惱、下濟百姓塗炭矣（中略）、輪王寺大王（按：即北白川宮）鈞命執達如件」。[69] 奧羽同盟諸藩以奧羽越公議府名義向全國公布此令旨，並將此令旨譯為歐文送達各國領事。[70] 7月12日北白川宮在隨侍僧大圓覺院義觀與清淨林院堯忍的隨同下，離開岳仙院，坐鎮白石城，奧羽列藩一致決議奉其為總督，同時發出布告文〈日光宮御動座布告文〉。此布告文與前述令旨相同地，對薩摩藩以「薩賊」稱之。其中詳敘薩摩藩罪狀，對於薩摩陷「日光宮（按：即輪王寺宮）」於禍，以及入罪德川慶喜，另其蒙不白之冤，同時從輪王寺宮如何進京為德川慶喜請命，但卻未能為其免罪。之後薩摩攻破上野輪王宮寺，北白川宮只好遠赴東北，「將平定凶賊，清明朝廷之務託付諸侯」。[71] 此布告文最後敘述如下：「如非皇國之民，誰能不知皇胤之尊。薩賊凶暴奸詐已如此，即便天日落地，海水乾涸，都誓言將此大績歸奉東叡山。恐天下士民不詳其事實者，未辨御宮深意，附會南北兩朝故事，作誣罔之說，故記述大略，布告遠近也」。[72] 由以上令旨可知，北白川宮欲借東北諸藩勢力，對抗以薩摩為首的西軍，而對其征討的罪名除了欺瞞幼主外，尚有陷北白川宮於禍以及入罪德川慶喜。但從布告檄文的最後可知，當時民眾對於北白川宮對抗西軍的戰爭，視作如日本中世南

69 同註68。
70 當時在日各國公使風聞：日本出現了兩位皇帝，便是因為東北諸藩將上述令旨昭告天下的緣故。
71 同註68。
72 同註68。

北朝的分裂，故風聞塵囂甚上，才需特別澄清說明。瀧川政次郎也指出：「據此，可察知奧羽士民間擁立御宮為天皇，仿南北朝故事，企圖對抗朝廷的氣運極為高張」。[73]

此篇報導結尾的日期為10月7日，但直到10月28日才在日刊的《臺灣日日新報》刊行，可說是具有雙重意義。首先是1911年該年乃大逆事件決審，處決幸德秋水等一干涉案者。另，此時也因上述的幸德秋水的審問紀錄外洩，而引發了南北朝正閏說紛爭。最後，此篇文章的刊行時間正好是北白川宮的忌日。根據官方紀錄，北白川宮病逝台灣的日期為1895年10月28日。但這則報導除了突顯北白川宮在幕末東西軍對抗，儼然成為東北新帝的歷史事實之外，更進一步證明南北朝政爭已經成為之後反照幕末時，東軍與西軍之間各立其主，二分天下的歷史鏡像。

六、結語

末延芳晴在《森鷗外と日清・日露戦争》指出，「親王曾一時對朝廷謀反，僭稱『東武天皇』」，[74] 認為鷗外在撰寫《能久親王事蹟》時，特別對於親王的死因，應該是故意疏漏了「對於親王不利乃至應該隱藏的事實」，「對於神格化軍神親王的一生，加以相當程度潤色的可能性極高」，認為「鷗外顧慮軍部與日本政府，再加上明治天皇，故意虛構」。[75] 而中村文雄於《森鷗外と明治国家》指出，森鷗外在甲午戰爭之後原本期待能即刻歸國，但卻被當時野戰衛生官石黑忠悳下令，即刻轉戰台灣。而鷗外在台灣的職位以及歸屬責任的不明確，中村指出是起因自與石黑忠悳之間失和的關係。[76] 這些因素都成為今後探討森鷗外《能久親王事蹟》的書寫視點與史觀的進一步線索。

森鷗外《能久親王事蹟》出版約百年之後，吉村昭最後的歷史小說，以「輪王寺宮」為主人公的《彰義隊》，不僅強烈地意識到森鷗外的北白川宮經

73 瀧川政次郎，《日本歷史解禁》，141頁。
74 末延芳晴，《森鷗外と日清・日露戦争》（日本東京：平凡社，2002.12），頁101。
75 同註74，頁100-101。
76 中村文雄，《森鷗外と明治国家》（日本東京：三一書房，1992.12），頁121-122。

典傳記《能久親王事蹟》，對「輪王寺宮」以及幕末歷史的描摹則以「敗者」史觀出發。小說中的「輪王寺宮」對於薩摩、長州二藩敵對情感的描寫也更直接、強烈。其中描寫「輪王寺宮」就任東北盟主之後，對於「夾強大武力收服朝廷，連江戶城都落入其手的薩摩二藩開始抱持強烈的敵意」。[77] 從「敗者」的史觀出發，我們能觀察到明治維新之後當薩摩二藩掌權，「征台戰役」成為受明治（薩長）政府權力重心排擠的「左遷者」者為主的戰役。「征台戰役」當時，從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等薩摩二藩出身將領所主事的台灣總督府，對北白川宮在征台戰役不合常理的軍事調度，似乎可推測出合理的解答。再加上森鷗外參與台灣之役的不尋常過程等徵候看來，征台戰役成為明治（薩長）政府權力核心肅清包括明治維新敗者等「邊緣化」集團之「布局」的意圖也似乎呼之欲出。另，從松林伯知的《北白川宮殿下》這本講談形式的傳記中反復出現的南北朝記號，便可清楚其中企圖呈現北白川宮於明治維新中的「敗者」形象。

《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10月28日〈北白川宮仙台御　在中の御事〉的報導，與明治森鷗外1908年所出版的《能久親王事蹟》更是呈現強烈對比。森鷗外對於北白川宮被東北諸藩擁立為新帝以及之後被命禁閉自省的描寫，幾乎都以曖昧的筆調帶過。從北白川宮決定前往東北時的描寫：「東叡山道場遭逢兵難，已失棲身之處。近日諮詢左右，皆道江戶危險，縱使倚靠大總督府，應也難期安全。因此暫時避亂奧州，待皇軍平定國內之日」，[78] 呈現了鷗外對北白川宮政治立場的觀點。對照《臺灣日日新報》報導中的布告文以及檄文，可知鷗外此篇傳記的歷史觀點與東北「敗者」反照的明治維新史觀，相去甚遠。從松林伯知的〈北白川宮殿下〉到〈北白川宮仙台滯留期間事〉，可知當時台灣主流的日語報紙媒體，基本上立足於東北「敗者」的史觀來建構北白川宮形象。而東北「敗者」的史觀如何成為在台日人文學觀建構的基礎視點，將有待下一階段的研究，持續探討。

77 吉村昭，《彰義隊》，頁325-326。
78 底線為作者所加。森鷗外，〈能久親王事蹟〉，《鷗外全集》第三卷，頁536。

參考資料

一、專書

佐藤元英監修、解說，《皇族軍人傳記集成　第3卷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日本東京：ゆまに書房，2010.12）。

上田正昭，《日本武尊》（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1960.07）。

小森陽一，《ポストコロニアル》（日本東京： 岩波書店，2001.04）。

山岡淳一郎，《後藤新平　日本の羅針盤となった男》（日本東京：草思社，2007.03）。

中村文雄，《森鷗外と明治国家》（日本東京：三一書房，1992.12）。

手塚豐編，《近代日本史の新研究1》（日本東京：北樹出版，1981）。

末延芳晴，《森鷗外と日清・日露戦争》（日本東京：平凡社，2002.12）。

吉村昭，《彰義隊》（日本東京：新潮社，2010.01）。

吉野利喜馬，《北白川宮御征臺始末》（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23）。

成田龍一，《〈歴史〉はいかに語られるか》（日本東京：ちくま学芸文庫，2010.03）。

西川滿，《自傳》（日本東京：人間の星社，1986）。

西村（時彦）天囚，《北白川宮の月影》（日本大阪：大阪朝日新聞会社，1898）。

星亮一，《奥羽越列藩同盟——東日本政府樹立の夢》（日本東京：中央公論社，1995.03）。

紀田順一郎編，《近代世相風俗誌集7》（日本東京：クレス出版，2006）。

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学志——日本詩人の台湾体験》（日本東京：明治書院，1995.06）。

清水卯之助，《菅野須賀子の生涯》（日本大阪：和泉書院，2002.06）。

森鷗外，《鷗外全集》第三卷（日本東京： 岩波書店，1987)。

菅原信海，《日本仏教と神祇信仰》（日本東京： 春秋社，2007.10）。

菅浩二，《日本統治下の海外神社》（日本東京：弘文堂，2004.09）。

菊地明編，《会津藩戊辰戦争日誌》（上）（日本東京：新人物往来社，2001.09）。

黃自進編，《近現代日本社會的蛻變》（台北：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6.12）。

黃榮洛，《北白川宮は新竹で死んだ》（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86.07）。
歷史讀本編輯部編，《カメラが撮られた会津戊辰戦争》（日本東京：新人物往来社，2012.08）。
龜谷天尊、渡部星峯，《北白川宮》（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1933）。
瀧川政次郎，《日本歷史解禁》（日本東京：創元社，1950.12）。
John W. Dower, *Embracing Defeat*（New York: W. W. Norton & Co., 2000）.

二、期刊論文

西川虎次郎，〈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殿下の御征戦に従ひて〉，《台湾》7卷1號（1936.01），頁4-6。
吳佩珍，〈日人作家的「文學史觀」疑義〉，《聯合文學》328期（2012.02），頁48-51。
———，〈日本自由民權運動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蔣渭水〈入獄日記〉中《西鄉南洲傳》為中心〉，《台灣文學學報》12期（2007.12），頁109-132。
村上祐紀，〈「皇族」を書く——『能久親王事蹟』論〉，《鷗外研究》88號(2011.01)，頁38-55。
武者小路穣，〈戊辰役の一資料〉，《史学雑誌》61編8号（1953.08），頁760-761。
長尾宇迦，〈「東武皇帝」即位事件——最幕末に存在した、歴史に埋もれたもう一人の天皇〉，《歷史読本》55卷8號（2010.08），頁126-131。
浅見雅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明治帝を激怒させたドイツ貴族との婚約〉，《文藝春秋》（2011.03），頁330-332。
菅浩二，〈「台湾の総鎮守」御祭神としての能久親王と開拓三神—官幣大社台湾神社についての基礎的研究—〉，《明治聖徳記念学会紀要》復刊36号（2002.12 ），頁95-119。
滝音能之，〈ヤマト政権にとっての「出雲神話」を読み解く〉，《歷史読本》58卷6号（2013.06），頁58-63。
鎌田永吉，〈いわゆる大政改元をめぐって〉，《秋大史学》14号(1967），頁68-73。
瀧川政次郎，〈知られざる天皇〉，《新潮》47卷10号（1950.10），頁122-127。

三、報紙文章

西村天囚，〈能久親王を台湾に奉祀する議〉，《大阪朝日新聞》，1895.11.07。

松林伯知，〈新講談預告〉，《臺灣日日新報》，1911.04.02，6版。

———，《北白河宮殿下》，《臺灣日日新報》，1911.04.03-1911.12.30。

撰者不詳，〈北白川宮仙台御滞在中の御事〉，《臺灣日日新報》，1911.10.28，3版。

四、電子媒體

「Japan Knowledge」（來源：http://japanknowledge.com/library/）。